

# 试论六朝时期的镇江古城

韦 正

镇江古城连冈三面，一水横陈，素享盛名。但有关镇江古城的历史记载多有舛漏，考古学材料也比较缺乏，故其面目不清。尤其是六朝时期的情况，因处草创阶段且历时久远，显得更加模糊，虽有东吴“铁瓮城”，东晋“晋陵罗城”等说法，真实情况如何，尚需考证。笔者不揣浅陋，草成下文，敬请方家识者指正。

## 一、三国时期的京城

镇江历史上最早的城池，一般认为是公元208年孙权所筑的铁瓮城，所依据的材料通常有以下几条：

“吴大帝孙权所筑，周回六百三十步，开南、西二门，内外皆固以**甗**。”<sup>(1)</sup>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权始自吴迁于京口而镇之。”<sup>(2)</sup>

“古谓之铁瓮城者，谓坚若金城汤池之类。”<sup>(3)</sup>

这几条材料的可靠性是需要讨论的，试以“铁瓮城”之名予以剖析。上述材料中以《輿地志》为最早，但该书虽指出“皆固以**甗**”，却并未出现“铁瓮城”一名。只是唐孙处元的《润州图经》才提出“铁瓮城”三字。按《輿地志》的作者顾野王，生于公元519年，卒于公元581年，是南朝梁陈时代的人，上距三国已有三百多年，结合《輿地志》中“郗鉴遂城京口”及“今之城宇多(王)恭所制”的记载，推测顾野王生活的时代三国古城即使有所保留，恐怕

也已面目全非了。作为有史可稽，详细记载镇江古城的第一人，顾野王应不至于遗忘城名。后人引用《輿地志》时疏忽城名“铁瓮城”的可能性也不大，虽然今人已见不到该书全文，但隋唐时人应是能见到的。再者，有关的正史，如《三国志》、《宋书》、《齐书》、《梁书》和《陈书》以及《太康地记》、《吴地理志》等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均无“铁瓮城”的提法。而且，“铁瓮城”名的命名方法也不符合三国的时尚，当时的城名基本上由地名后缀以“城”字构成，如广陵城、邳城等等，而“铁瓮城”名系一比喻，形象性极强。因此，顾野王之前“铁瓮城”一词恐怕是不存在的。但是，既然《润州图经》中称“古谓之”，则“铁瓮城”一词在《润州图经》成书之前肯定已存在了一段时间。不过，《润州图经》系以唐润州城为比较对象，追述唐以前的城池情况，是指孙权修筑之城，还是指郗鉴或王恭所筑之城抑或后代修筑之城，就更加难以确定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测：“铁瓮城”一词大约产生于南朝末至唐代之间，很可能就是唐代产生的；其得名缘由，很可能系文人附会“皆固以**甗**”一句而成。

如果说“铁瓮城”一词的渊源还存在许多疑问的话，那么，镇江历史上最早的城池不是筑于公元208年，而是在其前，则是确定无疑的。据《三国志·吴志·宗室传》载：“(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权弟丹阳太守翊为左右所害，以从兄瑜代。……及翊遇害，河驰赴宛陵……遂杀河……翊年十七，收河余众，缮治京城，起楼橹，修器备以御敌……兵皆乘

城传檄备警，欢声动地。颇射外人。”孙翊被害于公元 204 年，孙河又被杀、孙韶缮治京城，必在此后不久。《资治通鉴》卷四十六明确将此事归于汉献帝建安九年即公元 204 年条下，《建康实录》记载孙翊被害的时间只相差一年即公元 205 年。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至迟公元 204 年或 205 年镇江已有城池，其名曰“京城”，且“京城”应是三国镇江古城的真实名称。

为进一步确立上述论证，必须澄清“京城”有无泛指一地区的可能，这还将牵涉到“京”的含义。涉及“京”的有关记载常见者有以下数条：

“备谐京见权”。<sup>(4)</sup>

“瑜乃谐京见权曰：……”<sup>(5)</sup>

“刘备至京谓孙权曰：吴去此数百里……”<sup>(6)</sup>

“帝在武昌，诏屯京，知青、徐、汝、沛等军事。”<sup>(7)</sup>

涉及“京城”的有关记载常见者如下：

“伯父河，……后为将军，屯京城。”<sup>(8)</sup>

“韶年十七，收河余众，缮治京城。”<sup>(9)</sup>

“京城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sup>(10)</sup>

“初，京城之西有别岭入江，高数十丈，三面临水，号曰北固。”<sup>(11)</sup>

“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 209 年），孙权自吴理丹徒，号曰京城。”<sup>(12)</sup>

“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孙权徙镇于此，筑京城，周六百三十步……”<sup>(13)</sup>

可见，“京”系指一定范围的地域，“京城”系指建于“京”地的一座城池，“京”地无城不能称“京城”。

由上也可知道，“京城”的具体地点应与后世所谓的“铁瓮城”相同。文献史料及民间传说皆认为“铁瓮城”建于今北固山的前峰鼓楼岗上，此峰又称“铁瓮山”。《尔雅》云：绝高为京。唐代李吉甫剖析道：“按京者，人力所为绝高丘也，亦有非人力所为者。”鼓楼岗地势高亢，其上筑城，称为“京城”，理所当然。

公元 204 年或 205 年即已建成的“京城”是不是镇江历史上最早的城池，目前还不能肯定。上引“（孙河）后为将军，屯京城”的具体内容是孙河奉孙策之命驻孔京城。按孙策卒于

公元 200 年，这就意味着公元 200 年或此前镇江已有城池。只是此系孤证，文意也不十分明确。

谁是镇江古城的初创者呢？公元 200 年至 205 年之间，史书中有关孙吴方面的记载皆围绕孙权展开，但无一与筑京城有关。这段时间孙权的活动中心在吴郡一带，主要任务是南攻山越，西征黄祖，在京城建一座“固以<sup>京</sup>瓮”的城池似无必要。至于是否为孙河所筑，也不得而知。看来，镇江古城的初创者大概已湮没无闻了。

综上所述，镇江古城初创于公元 200 年或 204 年以前，名为“京城”，地点在今鼓楼岗上，建造者不详。后世盛传孙权建铁瓮城的真实背景，可能是公元 208 年时，为争夺长江中游的控制权，孙权将统治中心自吴迁至京地，在今鼓楼岗上利用原已存在的城池，“内外皆固以<sup>京</sup>瓮”，仍名京城。因其非常牢固，又保留了很长时间，故有铁瓮城之说。孙河、孙韶时京城的情况已难知晓，孙权加固后的情况，从《舆地志》中可了解一二。“周回六百三十步”，按五尺为步，此数合三百十五丈，即一千米左右，如此城为正方形，每边长约二百五十米，比孙吴建业的太初官还小，只能算是一座军事堡垒。“开南西二门，内外皆固以<sup>京</sup>瓮”，更突出了堡垒性质，与同时的石头城和郗坞等城堡相似。这一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三国时期军阀割据的设防城市的特点，也与孙权当时的实力和需要相称。

## 二、东晋南朝时期的京口城

东晋南朝时期，镇江古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是城名的改变，第二是两度营缮。

关于第一点，前已述及，三国时期镇江古城称“京城”，并无“京口城”的提法。《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如三国时有“京口城”的名称，陈寿决不至于不用。仅《太平寰宇记》卷八九引南朝宋山谦之《南徐州记》有称：“京口北为徐陵，其他盖丹徒县之西乡京口里也，权都秣陵，置京都督以镇”。如此条记载系追溯三国时情况，则“京口”一词在孙权时业已存

在，只是其名不显而已。可能由于“京口城”的名称“比京城”更能准确反映镇江的地貌和历史，所以逐渐取而代之，“京口”之名遂多见于东晋南朝的史籍中。如：

“郗鉴城京口”。<sup>(14)</sup>

“郗鉴谓平南将军温峤曰：“……又断贼粮道，然听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sup>(15)</sup>

“(庾)希夜入京口城。”<sup>(16)</sup>

“(宋文帝)又诏：京口城邑高明。”<sup>(17)</sup>

“京口”一词的含义，前人已有解释。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认为：“京上郡城，城前浦口，即是京口”。许嵩《建康实录》认为：“因京岷立名，号为京镇，在建业之北，因为京口。或云汉时已有京口，未详。”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上，东晋南朝时仍有用“京城”一词者，如前引之《南史·萧正义传》及《南齐书·州郡》，“京口城”、“京城”两名的混合使用以及李吉甫和许嵩的解释，都透露出东晋南朝镇江古城并未改变所在位置的信息，也与其它文献及考古资料相吻合。

关于第二点。两度营缮皆在东晋时期。第一次是在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贼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郡县，郗鉴遂城京口，讨平之”。<sup>(18)</sup>咸和元年距东晋立国虽只有九年，但距京城初建却有百余年，中经西晋数十年，原来“内外皆固以駸駸”的城池估计已破残不堪，因此郗鉴完全有缮治旧城的必要，郗鉴也应是缮治旧城的东晋第一人。第二次营缮是在王恭镇守京口时，大致时间是东晋孝武帝在位（公元373—396年）的末期。《舆地志》中称“今之城宇，多恭所制”。且有“王恭更大改创”的说法<sup>(19)</sup>。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王恭对京口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改建；二是王恭改制的京口城在梁陈时仍基本保持着原貌。从其它方面判断，王恭改制京口城是完全可能的，即孝武帝统治时期已算是东晋王朝较为繁盛的阶段，有大规模营缮的条件，且王恭有据此城判乱之意。

王恭“更大改创”的具体情况如何？据《太平寰宇记》引《京口记》云：“晋王恭为刺史，改创西南楼名万岁楼，西北楼为芙蓉楼，楼之最高者今存焉。”此说是可信的。因唐王昌龄有

《芙蓉楼送辛渐》一诗，说明芙蓉楼至唐时犹存。而西南楼即万岁楼存在的时间要更长一些，《至顺镇江志》卷十三云：“（万岁楼）“至唐犹存。宋呼为月台，后改为月观”。一般说来，按照史书的记述习惯，说明城市内部及附近地区事物的相对位置时，多以治所为基点。关于万岁楼、芙蓉楼的记载更应如此。北宋祝穆《方輿胜览》中的“千秋桥”条下云：“在府治西，晋王恭作万岁楼于城上，其下有桥，故以千秋名”。蔡方炳《方輿记》也说“千秋桥”在“府治西，晋刺史王恭建，上即万岁楼也。”按宋镇江府治亦在鼓楼岗上。今千秋桥位于鼓楼岗西侧近中部，地望上正与文献记载相符。由此可知，王恭时千秋桥的位置与今天的位置没有多大出入。但是，从今千秋桥向北不远即达长江，《至顺镇江志》卷十三引《舆地志》云：“此楼（万岁楼）飞向江外，铁锁縻之方止。”如上文所述，包括鼓楼岗在内的整个北固山实际上已临江而立了。因此，芙蓉楼的位置虽然今已不详，但芙蓉楼与万岁楼相距必然不远。这就意味着，如果芙蓉、万岁二楼之间的距离相当于王恭京口城的西垣之长，那么，整个城池就不会超出今鼓楼岗，很可能还没超出孙吴时京城即所谓“铁瓮城”的范围。由于这一范围很小，后世“王恭更大改创”的说法可能多指修城造楼而非扩大范围。

今人有所谓“东晋晋陵罗城”的说法<sup>(20)</sup>。该说认为东晋时期在今镇江市东面花山湾一带曾经修了一座城池，并根据有“晋陵罗城”铭文的护城砖以及当时晋陵郡设治于京口这一情况，认为该城名为“晋陵罗城”，且沿用了很长时间。此说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晋陵郡非晋仅有，唐朝亦曾设立，只是唐代的晋陵郡治在今常州。据《城渟毗陵志》卷二云：“（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初置毗陵郡……永嘉五年（公元311年）避世子讳并县改为晋陵，治于丹徒。太兴元年（公元317年）郡及丹徒徙治京口……成帝咸和年间复徙治丹徒……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还治晋陵……隋平陈，废南徐州，改州为郡，以晋陵郡治常州……天宝（公元742—756年）初尝改为晋陵郡，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复为常州。”由于常州与镇江地

接,唐代润州的地位较常州为高,如“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又分天下十五道,江南东道润为会府”<sup>(21)</sup>,晋陵郡(常州)为润州提供筑城用的城砖是完全有可能的。“晋陵罗城”等铭文大概表示城砖的烧造地点或陶工的来源等等,不能认为即是东晋城池的自名。其次,东晋晋陵郡治京口的时间不长,除上文所引《咸淳毗陵志》外,《宋书·州郡志》也说:“晋陵太守……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元帝改为晋陵,始自毗陵徙治丹徒。太兴初,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郗鉴复徙还丹徒。”晋陵郡治京口的确切时间是太兴元年至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共十二年。是时东晋王朝初建,国库空虚,政令不行,建造这样的一座城池实难想象。“东晋晋陵罗城”一说恐难成立。

### 三、镇江古城的缘起和地位

从大的方面来说,镇江古城的兴起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运动变化的结果;具体说来,地理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众所周知,东汉后期,中央与地方的合作政治逐渐遭到破坏,大地方庄园经济迅速膨胀,全国各地崛起大量的坞壁堡垒,以豪族中的特定之家为中心的宗族(血缘)或乡党(地缘)的地方性团结,形成了具备行政、生产、宗教等职能的地域社会。这些地域社会是国家分裂动乱的基因,它们互相吞并联合的结果就是形成地域社会集团,并最终形成割据政权。今镇江地区其时虽没有显要的豪族大家,但与之毗连的吴郡则有顾、陆、朱、张四大姓,这四大姓俨然是东南世家大族的代表,镇江地区处于其势力范围内。黄巾大起义后,孙氏成为东南豪族的共同领袖,割据江东,保护东南豪族的利益,成为孙氏集团的职责。为了对抗其它敌对力量,孙氏必须将经济上、地理上各方面与自身关系密切的地区连接控制起来,镇江首当其冲。

中国古代经济活动经历了一个在广大的时空环境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由于自然资源、气候、战争等因素的影响,经济重心迁移的主要趋势是由北向南,副趋势是由西向东。经济是基础,这场经济重心的迁移运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分布和发展情况,镇江古城亦不例外。在东汉一代卓有成效的开发基础上,随着大量人口和先进技术的移入,汉末三国时期南方经济发展出现一次高潮,南方的许多城市就是此时出现的,镇江古城即是其中之一。当然,处于初建时期的镇江古城在经济上尚不能完全自给自足,还需要南方经济中心——三吴地区的资助,终六朝四百余年,镇江古城范围未见扩大,也说明其潜力亟待挖掘。另一方面,随着以许昌为中心的中原经济区代替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区,曹魏与孙权在长江下游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其目的就是掠夺人口土地,蓄积力量进而击败对方。镇江古城显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经济与战略地位,可以说,镇江古城是孙氏政权发动争夺战的策源地之一。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东浸已将镇江变为南北经济的交汇点,赋予其极大的发展可能性。分裂割据局面不但使这种可能无法实现,甚至还起着负面作用。镇江古城的前途在于统一不在分裂,这是后来的历史事实已证明了的。

比较而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镇江古城得以兴起的首选因素,这是特定的历史背景造成的。藉长江之险与曹魏抗衡是孙氏集团的既定方针,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鲁肃就建议孙权“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sup>(22)</sup>实施这一方针的具体办法之一就是建城设垒,在镇江建城则可充分发挥长江之险的优势。镇江地区的地形可分为中央丘陵、北部沿江冲积平原和南部波状平原三区。中央丘陵由宁镇山脉和茅山山脉的余脉构成,大致呈内外二重分布。内重包括金山、焦山、北固山、象山、京岷山、磨笄山、黄鹤山、十前山、狮子山等山,与长江一道形成所谓“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sup>(23)</sup>的形势。外重包括高丽山、赶船山、朝凤山、五洲山、十里长山、九华山、回龙山、招隐山、洪山、雩山、~~崧~~山、五峰山等山,成为又一道天然屏障。北部沿江平原及沙洲系山长江挟带的泥沙冲刷淤积而成,西接石头,东至大海,北拒广陵,《瓜洲续志》卷三“漕运”描述道:“由京口抵石头,凡

二百里，高冈逼岸，宛如长城，未易登犯。由京口至孟渚，七十余里，或高峰横亘，或江沙泥淖，或洲渚错列，所谓二十八港者，皆浅涩短狭，难以通行。故江岸之防，惟在京口”。“南部波状平原系由断层蚀变而成，地势低落起伏，自古就是江南各地联系镇江的要道，由此可见，镇江古城的地理形势确实十分优越。再结合赤壁之战前曹操率大军江沿而下，大有踏灭江东的形势来看，孙权移镇镇江，东南可倚三吴为援，西可谋略荆楚，实为一明智抉择。此后，六朝皆都于建业（康），与京（京口）互为唇齿，镇江古城的重要性愈益突出。事实上，军事地理优势成为古代兴建城市的首选因素，镇江城并非特例，孙吴时期的另两座重要城市——建业武昌城的兴起也都缘由于此。

镇江古城的缘起决定了它在偏安的六朝时期必然享有较高的地位。孙吴政权先后派遣陶浚、孙楷、颜承等心腹为京督、京下督，孙韶加领幽州牧亦镇守在这里，可见对该地的重视。不过，孙吴政权既没有在此建立特别行政区域，也没有派遣更高级的官员，说明镇江古

城的地位还不是很。这是因为，孙吴政权内部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内乱。而且，南北敌对形势至三国后期已渐趋缓和。东晋南朝时期，大量北来人口的聚集，京口武人集团的崛起，尤其是齐梁二代的皇帝出生于此地，使得镇江古城的地位显著提高。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正式设州立郡，东晋在此共设立了二州十八郡六县，还兼领扬州之晋陵郡，为江南建置州、郡、县最集中之地。二是高级官员或亲王常镇于此，其中著名者如祖逖、庾亮、桓温、王恭、刘裕、萧道成、萧子良、萧宏等，他们的声望与级别远非孙吴那班官员可比，宋武帝遗诏中称：“京口要地，去都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sup>(24)</sup>三是政权安危常系于此，如苏峻、祖约之乱时，郗鉴在此筑大业、曲阿、浚亭三垒，成功地击溃了叛军，挽救了东晋政权。四是享有一定的特权，如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的土断令中明确宣布：“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sup>(25)</sup>由上可知，镇江古城在东晋南朝时的地位之高，而当时镇江一带的繁兴也可见一斑了。

(1)(18)(19)《輿地志》。

(2)《建康实录》卷一。

(3)《润州图经》。

(4)(5)(22)《三国志·吴志·周瑜鲁肃吕蒙传》

(6)《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7)《建康实录》卷二。

(8)(9)《三国志·吴志·宗室传》。

(10)《齐书·地理志》。

(11)《南史·萧正义传》。

(12)《元和郡县图志》。

(13)《读史方輿纪要·江南七》。

(14)(15)《晋书·郗鉴传》。

(16)《晋书·庾希传》。

(17)《宋书·文帝纪》。

(20)《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晋陵罗城初探》，《考古》1986.5。

(21)《嘉定镇江志·卷一》。

(23)《嘉定镇江志·卷二》。

(24)《南史·刘康祖传附延孙传》。

(25)《宋书·武帝纪》。

(本文编辑、终校 欧阳宗俊)